



末代公主 de 自述

爱新觉罗·显琦著

白素芝等译 柯田邦校

春秋出版社



《末代公主的自述》

这是清末皇族肃亲王的小女儿，爱新觉罗·显琦（金默玉）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书中叙述了她童年时代的公主生活和作为新中国公民的坎坷经历。她享受过不劳而获的豪华生活，也品尝过自食其力开办餐馆的艰辛，更体味了15年的狱中生活。书中还娓娓地描述了她的劳动、她的婚姻、她的不幸与有幸，以及有关肃亲王和她姐姐川岛芳子（金璧辉）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内容真实感人，情节生动曲折。书中附有作者的历史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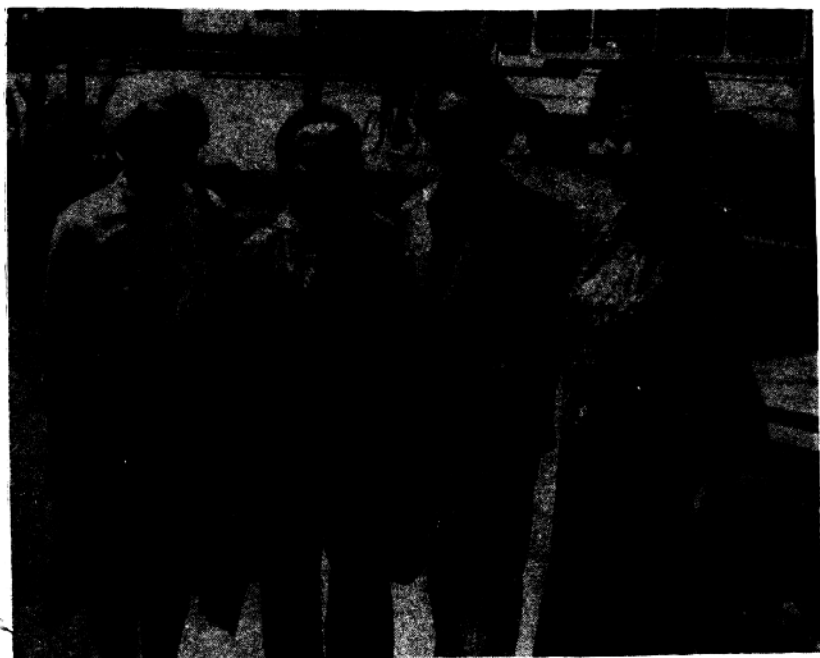
作者（右）的青年时代



作者的少年时代



肃亲王邸（旅顺）



作者（右2）与上坂冬子（右1）等在北京
的留影（1982年）

目 录

序 章	战后的北京……………	(1)
第 一 章	父亲的葬礼……………	(11)
第 二 章	怀念旅顺……………	(18)
第 三 章	回忆姐姐——川岛 芳子……………	(26)
第 四 章	进学习院……………	(34)
第 五 章	回国、停战前的北 京……………	(42)
第 六 章	从战后的混乱到开 设家庭餐馆……………	(45)
第 七 章	决心结婚……………	(59)
第 八 章	进入北京编译社……………	(76)
第 九 章	被捕之夜……………	(99)
第 十 章	服刑十五年，离婚 ……………	(142)
第十一章	在农场的生活， 再婚……………	(168)
第十二章	在北京的新生活……	(212)
后 记	……………	(216)
关于显琦 (金 默 玉)	…… [日] 上坂冬子	(220)
校译者的话	……………	(226)

序章 战后的北京

1945年8月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波茨坦宣言》公布日本彻底战败，北京的日本人惊恐万状。朋友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想反正国民也没任何罪过，因而未感歉疚。不过，巨大的不安依然向我袭来。我是清朝八大亲王一肃亲王的小女儿，清朝灭亡，父亲亡故，封建没落贵族家庭的未来命运，我个人的前途，一切都十分渺茫。

转瞬之间，国民党兵和美国兵以及戴着白色盔形帽的宪兵取代了日本兵。从东单到北新桥，道路两旁摆满了日本人的各种物品，甚至还悬挂着妇女的和服和内裤，……

以前一直被查封的娱乐场所也都开禁，舞厅、美国电影、酒吧，不一而足，街上骤然变得一片混乱。

我们兄妹从自己家搬到了东单一处有宽敞庭院的住宅。这是宪立哥（同母长兄）因妻子是日本人，不愿给其他兄弟姊妹招惹是非而决定的。

也就是这年的夏天，在还没有搬到东单之前，

我与芳子姐大打了一架。她就是受命运摆布的女性“川岛芳子”。她虽出身清朝公主，却成了日本人川岛浪速的养女，终以“东洋的太阳”被枪决。所谓太阳，是荷兰女间谍的名字。川岛芳子也是被作为中日战争（即日本侵华战争——校注）时期的日本间谍而被枪毙的。芳子几乎比我年长一轮，是同母所生。芳子姐曾多次邀我与她同住。我当时一看她周围的人，看她自身的生活态度，就大失所望，打心眼里就不同意，因而一直拒绝未答应。为了尽可能不与她见面，每天都到亲戚家去。大概这冒犯了她的龙颜，一天她采用了非常荒唐的作法，就是用她贴身男仆日本人小方八郎的名字给我送来了一封情书。我一眼就识破了她的卑劣勾当，于是，勃然大怒。从此我们姊妹之间，感情上产生了明显裂痕，我也再不登她的门。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突然带着一个不认识的中国流氓闯进我的居室来，拔出军刀胡作非为。她对我说：“快认错！”我当然没有理由认错，就说：“有话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说。”她马上说：“我不象你有学问，你能说会道是不是，你欺负我是不是？”她边说边随手打坏了玻璃架和窗玻璃。母亲房间里的人听见了便惊慌赶来。当然，我从未大喊一声。她似乎以为用军刀打我，我就会大声呼救。

过了一会儿，佣人大声告诉说二哥回来了，她

吓了一跳，住手不打了。二哥说：“这是干什么？有话到我屋里去！”将她带走了，我也跟在后面。二哥申斥她说：“为什么这样撒野？说出理由来！”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为什么我过生日你不来？”芳子姐在昭和初年（注：1926年）曾以“男装美人”在日本风流一时，服装毋庸说，就是语言也完全是男人的。我吃惊地愣了一下，反驳说：“谁知你一年过几次生日呀！动不动就说过生日，索取大家好多东西，还是停止你这种不光彩的行径吧！”她好象很懊丧，就用脚踢我。

在此之前，哥哥当然还不知道用军刀打我的那些事，我也没告诉，所以，并没有那么生气。现在，见川岛芳子在他眼前踢我，哥哥怒不可遏，将她拖到一旁，说：“干什么？”这时大哥回来了。她一听说，可能想到哥俩打她可受不了，于是，赶快带着流氓逃出门去。大哥进屋之前还不知道我被打的事。我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大哥问：“怎么啦？她又来做什么？”我说：“打架啦。说我没去给她过生日，找碴儿打架来啦。你看！窗玻璃和玻璃架。”我这么一说，大哥才看见里屋的样子，吃了一惊，问道：“什么？来撒野来啦？打你了吗？”问完立即跑了出去。后来听佣人说，大哥拿起院子里的门闩奔到大门口，正好使用木炭煤气的车发动机还未发动起来。大哥就朝车

里猛捅。据说那时她蹲在座席下面，而且大喊快开车。如果当时不是佣人们拚命搂住大哥，劝说他：“请息怒！用那东西打可危险！”恐怕哥哥会把她从车里拖出来。幸亏发动机好不容易发动起来，她才逃之夭夭。

那时，她已经因染上吗啡瘾而完全丧失了人格，看来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在我们搬到东单后的2年时间里，除为日本朋友回国送行之外，我几乎全呆在家中读书，或与常来的客人聊天。不久，嫂子回日本的事经商量定了下来。

国民党进入北京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接收大员”时代，北京比日本时代还动荡不安，没有一日安宁。物价飞涨，纸币更换，街上“大洋”（银元）黑市交易猖獗，共产党马上就要进城，这些使得人心愈发惶惶不安。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芳子姐被捕受审。不久，报纸每天都登载她在法庭耍弄国民党审判官的情形。这已成为北京市民的话题。

大哥仍然想着兄妹之情，不能对她弃而不问，想方设法给她送东西。如上所述，我们迁居的地方是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在与此相邻的东观音寺胡同有日本侨民委员会，还有日本寺院的和尚。国民党时期，作为“留用人员”，留下了日本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事隔还不到3年，解放军

（共产党）就进城了。还在芳子姐等待判决的过程中，共产党进城的呼声已经一天高过一天。

一天，报纸上突然发表了“汉奸金璧辉被判死刑”的消息，汉奸就是出卖中国的人，金璧辉是川岛芳子自己起的中国名字。我想那大概是1947年秋天的事。但是，那时是初审判决，其后申请复审，照样轰动了社会。当时的北京小报每天都刊登她在法庭进行答辩和蔑视审判官的情况。竟公然恶言恶语攻击国民党，这在老百姓中博得了赞誉。

大哥放心不下，每天都出外想办法。我们搬到东单住的房子原来是日本牙科医生的诊所，后面好象是一个仓库。我们是通过一位关系密切的医生的介绍而搬来的。可是，这又出了大事。那时，国民党正在逐一搜查日本人的住宅。一天，突然传来令人恐怖的敲大门的声音，老妈子和哥哥的小孩都吓得发抖，跑到我这里来，吵嚷着：“怎么办哪！”“我怕！”“我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稍加思索了一下。可是，这功夫敲门声越来越猛，四五个男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那时，在北京常有国民党兵闯入民宅为非作歹，因此，哥哥不在家，若日本女性的嫂子有个好歹，那可非同小可。我毅然走出去，隔着厚厚的木板门问：“有什么事吗？”

对方果然象当兵的，将上了刺刀的步枪倒过

来用枪拖猛击大门。我再次大声怒斥道：“不是问你们有什么事吗？！不懂啊？”对方也发怒了，叫喊说：“开门！不开就砸啦！”我又顶了一句：“这门是不开的呀。从收信箱往里面看就知道了。不是堆着这么多的煤吗？若有事，请绕道从后门进来！”他们轮流着从收信箱往里望了望，嘀咕了一会儿，说的什么一点也未听清，象是湖南方言。过了一会儿好象走了。可是，这回后门就危险了，我赶紧回到仆人的屋里，让他们做好准备以应付万一。确实做好了马上打架的精神准备。但不知为何，左等右等谁也未来。

不知不觉中，嫂子回到了日本，我照料着四个孩子。哥哥正在准备与贸易团一起去香港。因此，这段时间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1948年3月快到月底的一天，突然听到消息说：“金璧辉今晨6时40分在北京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我看到了登有芳子姐死时照片的报纸，好久都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心情。然而，坦率地说，一滴泪都未流。我甚至反倒认为：她不是正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吗？

听说事后，哥哥将她死后的事宜委托给北京东观音寺的古川和尚。

不久，朋友C先生给我看了两张照片，这是芳子姐处决后的照片。一张是枪毙之后倒在地上，头发很长，是女性剪发，没错正是姐姐本人。另一张

是用日文写给川岛浪速的遗言。据说这是某外国记者拍摄的。听说她在狱中中断了吗啡的注射，头发也长长了，所以，有人认为与她往日的形象相比判若两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张照片是站在头部方向从上向下拍摄的，因此头发蓬乱，脸部照得不清楚。但是，体态也好、手脚的样子也好，肯定是她无疑。当时，她已年过四十，比以前稍胖了一些。就这样，“金璧辉”的事似乎已经了结。可是，还没过2个月，街头巷尾又谈论起她的事来。这次谣传说死的是替身。原来，那天执刑时，不知为何，国民党不允许任何一个中国记者进入现场，而只让美国记者进入，所以中国记者愤慨至极，因无法发泄对法院的积愤，而连篇累牍地大肆报道“替身”的消息。因此，直至今天还有人相信“川岛芳子还活着”。

在小巷里，每当有日本留用人员撤回国时，就会出现“接收大员”，以“接收”的名义，把日本人专用的大公馆及各机构的所有物品抢劫一空。当然，即便是中国人，若是被指名为“汉奸”的人家也逃脱不了这种“接收”。为此，街道上总有卡车和货车闹哄哄的。

从国民党进了北京之后，街上到处都是美国兵和虽是国民党却全身上下都是美军打扮的军官们的横行霸道。吉普车横冲直撞，强奸妇女、打架斗殴等等，都成了家常便饭。但国民党对此熟视

无睹，越来越引起市民的不满。

戴着金边眼镜的国民党军官们大多是矮个子的四川人和湖南人，他们好象不约而同似的，都一只胳膊搂着舞女或妓女出入于舞厅、酒吧间、咖啡馆。区别于国民党而戴着白色盔形帽，手持短棒的美军宪兵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老北京的居民们对这种横行霸道的行径感到失望，只是在外边守口如瓶，不说什么，可一回到家里没有不骂的。再加上物价天天上涨，主食大米和面粉一日三次涨价，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货币接二连三地变，以至到了去银行取款非使用麻袋不可的地步。“国民党也快完蛋啦”，这种窃窃私语越来越多。

这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北京的洛克菲勒医院（现首都协和医院——校注）举行会谈，“共产党入城”的呼声愈来愈高。

家中的情况是，哥哥打发妻子回日本后，自己也为逃往香港而奔波于北京、天津之间。我留下来看家，与在我家侍候了几代人的老妈子为伴，专门抚育哥哥的四个小孩。

因为北京也受到了袭击，所以人心更加混乱，家中的老妈子等每天都惊慌失措。有一天，真的在北京南苑机场落下了炸弹。而且，在街上不断地流传各种流言蜚语，传得神乎其神，象真的似的。对于共产党，有欢迎派、反对派、也有恐惧派，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当时，正值临近旧历新年，谁

也不知前景如何，见面就说：“当真会怎样呢？”以此代替了寒暄。

就在这种气氛中迎来了春节，第二天突然传来共产党入城的消息，我一个人站在“灯市口”和“八面槽”的拐角处，夹在众多的市民中间欢迎了分乘数百辆卡车入城的共产党部队。那一天我是有事上街的。夹在部队的卡车中，在市民欢迎队伍的卡车上，有一个极热情的人举手跺足地高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给我留下了印象。道路两旁，群众挤得水泄不通，每人手里都举着一面小红旗。我不由得奇怪起来，他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么多的旗子。还有，共产党的朴素打扮也令我惊叹不已。我以往见过日本军人，国民党军人，还有美国军人，这次看到共产党的军人穿着布鞋确实深受感动。

这期间，哥哥还在继续办理参加贸易团体去香港的手续，不久就要启程。在即将启程之前，哥哥委托一个外国人把巨款兑换成美元，然而却全部被那个外国人拐跑了，因此，只得把留给我的钱带了去。我没过多考虑，但哥哥好象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哥哥把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拉到身边，流着泪说：“我最担心的是以后见不到面，就是能见到还不知何年何月。”我说：“什么呀！男子汉还哭哭啼啼，请放心走吧。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你

的四个孩子饿死。”哥哥离家后，我才醒悟过来，至少应该让孩子去送送，我急急忙忙光带着男孩赶到了北京站。幸好火车还没发车，哥哥意外地见到我们去送行，好象特别高兴。从这一天起，我开始照料哥哥的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下面二个都是女孩。此外，还有老妈子和她的女儿，二哥的二个孩子，共计九口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哥哥留下的现金只有100元。

这样一来，一家人分的七零八落，每当依靠我的孩子们围着我的时候，我就感到责任重大，沉重的担子都压在了我的肩上。这就是留在我心中的、作为亲王的最小公主所渡过的岁月。